北 京 文 化 通 讯

2012 年第 8 期

（总第 8 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 十八大报告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确定原则、方针：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刘玉珠解读十八大报告文化强国建设新提法、新观点、新思路

动态关注

■ 北京论坛（2012）开幕：世界新格局下的机遇与挑战

■ 第十一届博物馆数字化推广论坛开幕

媒体聚焦

■ 标新还是仿古？：城市建筑文化的忧思

■ 谁的光棍节？：节日文化的畸变

尖峰观点

■ 阎云翔：道德底线的突破及其伦理意涵

■ 李之美：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

海外视野

■ 美国：两部税收法案促藏品流入博物馆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十八大报告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确定原则、方针：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

（三）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开展“扫黄打非”，抵制低俗现象。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增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繁荣文化市场。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

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

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选自十八大报告）

（2）政策解读

■ 中宣部等部委介绍文化体制改革记者会实录

11 月 11 日，十八大新闻中心邀请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志军，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少华，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田进，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蒋建国介绍文化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以下是会议实录摘编。

孙志军说，文化体制改革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二是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带来的新挑战，四是主动适应高新科技特别是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提出的新要求，五是切实解决多元多样多变环境下文化引领发展的突出问题。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蓬勃发展。同时，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

赵少华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体制改革、机制的改革在不断地深化。第二，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建立。第三，文化艺术生产进一步繁荣，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大幅度的提升。第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了国民经济支柱性的产业。第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不断地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弘扬。第六，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也是更加活跃。

田进介绍了我国发展广播影视的一些成功经验，一是坚持导向为魂，始终坚持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坚持公益优先，强化文化为民、文化惠民。三是坚持品质至上，始终把提高质量放在

重中之重。四是坚持创新驱动，积极地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体制机制。五是坚持严格管理。始终做到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以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促进广播影视健康有序地发展。

蒋建国指出，我国的新闻出版业涵盖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011 年，我国新闻出版业实现营业收入已经达到14569亿元、增加值达4022亿元。实施了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东风工程”，民族地区群众看书难看报难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还实施了提升国民素质的全民阅读工程，特别是实施了服务农民的农家书屋工程。

赵少华在谈到国有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时说，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育演艺市场主体，使其更具有生命力。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多，因为国有文艺院团普遍底子薄、包袱重，实力比较弱，缺少走市场的经验。下一步，我们会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促进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加大扶持力度。我们采取转制一批、整合一批、撤销一批、划转一批、保留一批，对不同的类型明确不同的改革发展要求。

孙志军最后补充说，在涉及整个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注意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对已经实施了转企改制的，我们国家政策也很明确，叫“扶上马、送一程”，仍然保持财政投入的基数不变，同时，转变投入方式，不像过去发人头工资，而是购买它的服务。

（据人民网摘编，2012 年 11 月 11 日）

■ 刘玉珠解读十八大报告文化强国建设新提法、新观点、新思路

11 月 12 日 10 时，文化部文化产业司长刘玉珠做客强国论坛，以“十八大报告文化强国建设新提法、新观点、新思路”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以下是文字摘录：

十八大报告当中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论述提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是要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这个概括点出了我们文化强国建设的精髓。“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就是把文化产业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党和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不是权宜之计，是根据我国原来是“四位一体”，现在叫“五位一体”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而提出的。文化产业首先是文

化，其次才是产业，我们向社会、向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必须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冲突，和我们的法律法规不相矛盾，这样才能投放到市场上来。中央提出在文化产业上也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不能够简单地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增加 GDP 比重或者达到 5%以上就算完成任务了，因为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发展文化产业我们说“又好又快”，“好”是指文化产品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快”是好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尽管这十几年来，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纵向比发展很快，基本上能够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但是横向比，我们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他们的认识和措施、成效都走在我们的前面，因此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情。

要发挥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文化“走出去”是必然选择，文化“走出去”一是从政府层面，通过政府间的文化交流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鼓励企业、鼓励企业家开拓国际市场，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增强人们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最主要的形式还是要有一大批能够适应各国文化消费者消费需求，他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被人们接受，这样才能真正使人们对中国的文化产生兴趣，沟通、理解，从而达到相互的尊重，这样长期下去形成积累，对中国的了解更加客观、全面、真实，这样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才是真正的提升。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2 年 11 月 12 日）

■ 张国祚：从党的十八大报告看文化强国之路

11 月 16 日，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做客由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国社会科学网和光明网联合主办的“十八大观察家”栏目，从文化强国的角度解读党的十八大报告。以下是访谈摘录：

文化除了艺术品位、艺术构思外，高科技含量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文化和科技融合得好，势必会产生新的文化业态。比如现在的 3D 电影、特种电影、动漫、文化主题公园等。新的文化业态搞得好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受众的需要，

而且能够让文化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例如深圳华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特种电影和动漫已经出口到全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说明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科技含量，不断创造新的文化业态，使之深受国内外观众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五项新要求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就是“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第一，必须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深入人心。第二，扩大文化来对外交往，以汉语国际传播为先导。第三，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第四，要重视人才，要创造有利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还要有激励机制，使真正有作为、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上都能得到尊重与承认。在构建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第二，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放宽政策，允许外资的引进以及中外文化产业合作。第三，政府要给融资渠道适当开绿灯，政策要保障文化产业的融资渠道畅通，文化产业市场的开拓，不能任由市场规则横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做了层次上的区分。从国家的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层次的区分，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培育过程，无需急于定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样表述那么长的句子，如果不易懂、不易记，老百姓就没办法践行，所以要对其进行概括、提炼、升华。但是，这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培育过程，不需要刻意急着去概括。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摘编，2012 年 11 月 25 日，记者陈叶军）

■ 鲁炜：关于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情况的报告

2012 年 11 月 17 日，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上，北京市市委宣传部长鲁炜提交了《关于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情况的报告》，总结了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工作成效，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 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切实加强，全社会文化资源有效整合，文化活力竞相迸发，文化能量大大释放，文化创新进入活跃期。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更加深入人心，北京精神得到弘扬。
3.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文化惠民工程内容丰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4.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加科学，文化遗产资源传承和利用取得新的成效。
5. 首都文化经济形态凸显，文化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拉动，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
6. 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文化市场管理不断加强，有力维护了首都文化市场秩序。

■ 孙世超：关于对推进全国文化中西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世超提交了《关于对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肯定了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七个方面的成绩：1. 明确了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目标和任务；2.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3. 大力推进首都公民道德建设；4. 精品创作生产取得佳绩；5. 加快了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6. 努力挖掘名城历史文化；7. 进一步完善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 进一步增强首都意识和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责任感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是首都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通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推动首都城市发展转型

二、 对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进一步的研究规划

1. 进一步明确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2. 制定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总体规划

三、 抓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基础工程

1. 加强思想文化建设

2. 保护、挖掘和传承名城历史文化
3. 大力推进首都公共文明建设

2．动态关注

■ 北京论坛（2012）开幕：世界新格局下的机遇与挑战

11 月 2 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北京论坛（2012）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本次论坛以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新格局·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为主题。论坛为期 3 天，300 多名海内外知名学者和嘉宾将集中对新形势下的“新格局、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进行深入研讨。

开本届北京论坛将展开涵盖经济、哲学、教育、城市、语言、新闻、企业家等方面的八个分论坛，主题分别为：“反思资本主义：后危机时代世界面临的挑战”、“信仰与社会——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反思”、“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世界城市精神传承——经验与创新”、“文明的构建：语言的沟通与典籍的传播”、“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创新与变革”、“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社会企业与企业家责任”、“共同的世界，不同的视角：德国、欧洲、中国”。

（据人民网理论频道摘编，2012 年 11 月 02 日，记者李晓明、赵晶、万鹏）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解读》出版

近日，由文化部部长蔡武主编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解读》（以下简称“《解读》”）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解读》内容与《规划》中的章节相对应，以《规划》内容为重点，又有所展开，重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详细论述《规划》内容产生的背景、《规划》内容的展开和细化，特别对《规划》中 8 个专栏进行了细致分析，突出了对“十二五”时期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关键性问题、标志性项目的解释，注重用事实说话，力求准确反映“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的前景和相关考虑。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文化部各司局同时进行了《解读》的编写工作。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2 年 11 月 8 日，记者张雪）

■《中国文化强国战略》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化强国战略》出版座谈会与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北京举行。与会者结合郭建宁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一书，就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如何贯彻文化强国战略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者强调，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要把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和部署上来，应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文化自觉，正确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切实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责任；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文化自信，客观分析面临的挑战和有利条件，激发文化建设热情，信心百倍地做好文化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壮大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自强，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利用丰富文化资源，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步伐。

（据《人民日报》摘编，2012 年 11 月 26 日，记者张学成）

■第十一届博物馆数字化推广论坛开幕

第十一届博物馆数字化推广论坛暨十周年纪念学术年会 12 日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针对中国近年来文化遗产影像采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确定的，重点解决文化遗产影像采集拍摄的品质问题。论坛内容包括专家讲座、经验交流、新技术展示等一系列活动。所谓数字化博物馆，指将博物馆相关的器物、标本及文件等各类信息，通过 3D 模型虚拟制作、三维扫描、数字化拍摄等技术，将藏品信息以数据库或资源中心的形式储存，提供藏品的多角度、近距离 3D 赏析，对藏品相关的历史、艺术、文化及故事等，进行以图文介绍和语音解说、动画展示、视频延展等呈现方式进行信息推送。

（据中国新闻网摘编，2012 年 11 月 12 日，记者奚婉婷）

3．媒体聚焦

■标新还是仿古？：城市建筑文化的忧思

编者按：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一座座执意于标新的地标性建筑在神州大地上拔地而起，如北京的“大裤衩”、苏州的“秋裤”、杭州的“比基尼”、

上海的“开瓶器”、湖州的“马桶盖”等，将创新意识运用到了极致。另一方面，有些城市却大兴仿古之风，纷纷斥巨资仿建古城，兴起了一股仿古的风潮。这种城市建设的“新”、“古”问题，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有文章认为，城市的地位性建筑不能仅顾及外观上的前卫，还应考虑到广大市民的接受能力与欣赏能力。《人民日报》刊文认为，那些审美艺术的“学院派”知识，也需要对接社会大众的审美认知。毕竟，火热的生活与真实的感受，是所有审美艺术的根源。对接公众感受，并非要在建筑审美方面搞“民粹主义”，而只是在权力审美与公众感受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至少让我们的地标建筑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不再引起恶搞式的“负面想象”。（据李拯：《兴建地标建筑应尊重公众感受》，《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20 日）有人认为，这些地标性建筑在设计时都遗失了中国特色，从模仿国外建筑风格，到聘请国外设计师，逐渐迷失和舍弃了中国风。中国建筑没有体现任何中国文化，是一种没落和退步。（据汪恩民：《七星酒店被称“马桶盖” 国内建筑被指迷失中国风》，中国新闻网，2012 年 11 月 24 日）有的文章则对这类建筑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建筑师在进行设计时，理念一般会适当超前，公众接受就需要一个过程。建设初期，埃菲尔铁塔、卢浮宫门前的玻璃金字塔也遭到过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多年后，大众才逐渐从不解到欣赏。社会也需要有差异美，对待新生事物应该包容。（据黄帅：《雷人建筑是丑陋还是经典 专家:首先应考虑功能》，《长江日报》，2012 年 11 月 14 日）

对于城市的仿古建设，媒体则大多持批评态度。《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批评道，如今很多地方的古城复建的思路和模式已高度同质化——无非就是修复一些老古董老建筑，然后仿建几条古道几个古街区。更值得担忧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回到过去”，名义上是要保护历史文化遗迹，或通过古城复建打造地方文化新名片，实质上却依然是打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算盘。这种“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古城复建，最终收获的往往是宏伟漂亮却缺乏文化意蕴的赝品。（据汤嘉琛：《古城复建：文化幌子难掩功利底色》，《中国青年报》，2012 年 11 月 20 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也强调了城市建设中文化的重要性。文章说，现在的古城重建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如果有“体”无

“魂”、有形式无内涵，就难免遭遇市场和公众的双重否决。在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重要一极的今天，任何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的伪文化行为，不但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可能带来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据闻白：《文化建设需要防止盲目跟风 “古城热”切莫丢了文化魂》，《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9 日）

■谁的光棍节？：节日文化的畸变

编者按：光棍节日在每年的 11 月 11 日，这个节日既不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不是从国外引进的“洋节”，而是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南京高校，是校园趣味文化的代表产品。近年来，光棍节的气氛渐渐向社会弥散，特别是经商家的炒作之后而广为人知。今年的光棍节，淘宝网在声势浩大的宣传下取得了 191 亿元的销售业绩，有近 1000 万的市民坐在电脑前抢购商品，甚至有人因连续 18 小时不吃不喝地购物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我们不禁要问：光棍节何以致此？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审视了光棍节的形成原因。光棍节体现了青年群体自尊、自爱、自信、自强意识，体现了青年群体自嘲、纠结、从众的矛盾心理，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草根性，新闻媒体的介入与商业的运作也为光棍节推波助澜。光棍节的制造，是当下的青年人赋予其一定的内涵来构建自己的文化与群体身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据黄英：《“光棍节”是怎样炼成的》，《中国青年报》，2012 年 11 月 12 日）有的文章反思了光棍节是如何与购物消费关联的，文章援引美联社的报道称，在商家的推波助澜下，“光棍节”已经演变为一年中销售的黄金期和商家的“集体狂欢日”。文章认为，对于很多光棍宅男们来说，抢秒杀、淘便宜的体验简直就像在网络游戏里拼杀夺宝，这使得人们乐意将此作为一种过节方式。加上“双十一”大战开锣之前，淘宝、天猫等各大商城还大搞了一轮充值送优惠行动，使得人们肆无忌惮地买。另外在网上买东西，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可以选择的商品种类比逛商场还多。正是“快乐”、“实惠”、“方便”，这三大要素成功地将光棍节与购物消费联系起来并最终捆绑在一起。光棍节也就水到渠成地变成了一场在线普天同庆的“购物狂欢节”。（据周照：《光棍节是肿么变成购物狂欢节的？》，《南方日报》，2012 年 11 月 16 日）也有文章对这种狂欢式购物进行了反思。我们总是喜欢拿节日来

装点乏味的日子，我们总是习惯用狂欢来表达对一个节日的追捧。可是我们除了沦为商家促销的道具，几乎找不到其他狂欢的方式。那句被传唱的“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一点都不假，看似狂欢，其实我们还是孤单的——孤单到只能用消费来缓解内心的寂寥。（据陈方：《光棍节，谁在消费着你的消费》，《中国青年报》，2012 年 11 月 13 日）

尽管商业渗透无可厚非，但有的观点认为，资本将年轻人的“自嘲”诱导成购物节的做法，是对流行文化的“绑架”。“光棍节崛起”让人思考，资本强势在面对社会现象和心态时，是否只有开发利用甚至粗暴绑架一种姿态。“我消费我快乐”的“光棍节”购物理念，掩盖了消费冲动背后当下中国 1.8 亿单身男女需要缓解压力、释放能量的诉求。“光棍”不但需要掏钱，而且他们的身份成为被电商广告消费的对象，电商行业和企业的人文关怀已迷失在流量数据中。（据王磊：《电商促销贴上文化标签 学者：一场混乱的商战》，《文汇报》，2012 年 11 月 13 日）还有文章从节日文化的角度还反思光棍节。文章认为，用“沦陷”来描述当今社会的节日文化一点也不为过，节日在多数人眼中的表达，在情感中早已失语，完全被金钱物质所占据。当所有的节日文化千篇一律地“自我陶醉”在买卖中时，中国节日文化的传统彻底“沦陷”了。要认识到用购物血拼来填充所有节日，是一种“傻大粗”行为。最重要的，寻找每个节日的根源意义才是让文化夺取高地的好战略。当新生节日文化产生时，注重其背后的诉求才能看清节日需求的本质。光棍节的诉求在于社会青年单身问题。（据杨公振：《从“光棍节”反思沦陷的节日文化》，观点中国网，2012 年 11 月 12 日）

■“干露露式娱乐”之罪

编者按：影视演员干露露于 11 月 24 日参加江苏教育电视台综艺节目《棒棒棒》，在节目录制现场，干露露与她的妹妹和母亲三人在与观众互动问答环节中产生分歧，继而用极其污秽、肮脏的语言对观众及随后采访的媒体进行谩骂。“撒泼录像”被网友上传至视频网站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自身也由此引发网友热议，多家媒体就此事刊发了评论。随后广电总局责令停播该节目。

绝大多数媒体都支持国家广电总局对《棒棒棒》的停播决定。有观点认为，干露露母女之所以能够“走红”，是她们的行为是在不断地挑战底线，制造矛盾

冲突。要让低俗炒作者收手，就必须对他们所制造的噱头进行审查。面对干露露母女不断挑战道德底线，以裸露挑战公众底线的行为，相关部门应该要管。也可借鉴电影分级制度，推动建立电视节目内容评级体系，对电视节目内容作出分级限制。只有依靠严密的制度，加上公平和公正的执行力，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电视媒体的低俗化趋势，使青少年免于低俗电视节目的负面影响。（据钱兆成：《制止“干露露式”恶俗有理有据》，《法制日报》，2012 年 11 月 30 日）社会上还存在一种“干露露崇拜症”，一些电视媒体为了赚取收视率，竟然不惜成本邀请干露露母女做节目，任其在电视上撒野、口出污言秽语。这种投机取巧、从庸媚俗的做法，为干露露们的大红大火推波助澜，实际上比干露露母女本身更应该批判。（据李思辉：《媒体应警惕“干露露崇拜症”》，光明网，2012 年 11 月 30 日）有文章分析道，电视台与争议人物，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后者的话题性，能转化为前者的收视率；同时，前者支付的“出场费”，则是后者梦寐以求的实利。干露露们横空出世，恰在于市场需要她们。尤其对那些“嘉宾依赖型”节目而言，大牌明星、干露露式的异类，简直是生存之本。平庸的综艺界，或已丢失了“拼创意”的能力和耐心，继而悲剧地迷失于“争夺嘉宾”的狂热中不可自拔。（据蒋璟璟：《给钱才发飙，“出格节目”的诞生与净化》，《华西都市报》，2012 年 11 月 30 日）

有观点认为，干露露事件是因为有些媒体并没有搞明白媒体人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扛什么样的旗。中国的新闻媒体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扛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旗。特别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守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德。只有这样，媒体才能够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据李识君：《干露露事件的反思 媒体应该走什么路 扛什么旗》，观点中国网，2012 年 11 月 29 日）新华网的文章也指出，干露露的事件表明，在社会需要正能量传递的今天，电视节目过度低俗化只会是饮鸩止渴。广播电视等播出机构可以有娱乐节目，但不能完全依靠娱乐节目，更不能将娱乐节目低俗化。有价值观的收视率才是有价值的收视率。（据俞俭：《电视娱乐节目过度低俗化是饮鸩止渴》，新华网，2012 年 11 月 29 日）

4．尖峰观点

■阎云翔：道德底线的突破及其伦理意涵

阎云翔在复旦大学“当代人类学讲坛”的演讲中，从三方面展开阐述当代中国道德底线的突破：第一，证明非道德行为的确存在；第二，从受害者和加害者两个角度讨论这些非道德行为对个体经验产生的效果；第三，界定非道德行为，在此基础上，讨论多元道德对今天中国社会带来的挑战。

作者在研究“做好事被讹诈”的个案时发现：社会中广泛存在对人们做好事的本能怀疑，怀疑人类向善的内驱力，认为做好事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这是值得担忧的。作者还发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则对整个社会的公信力产生了最大的冲击力。“做好事被讹”和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很信服地证明不道德行为确实存在。在这两类事件中，受害者会产生心理恐惧，缺乏安全感，进一步产生不信任感。

非道德事件对社会公信力最大的冲击，就是我们无法建立这种社会信任，结果就是人们转向其反面，求助于个体信任，最后发现，只有父母是可靠的，或者再加上亲朋好友。两者是此消彼涨的，对个体信任的严重依赖，意味着永远也没有办法跨进对陌生人、制度和专家的社会信任中去，那么整个社会的转型就很难实现。对加害者而言，这是个良心问题。“做好事被讹”中的当事人会给出各种理由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我又不认识他”，成为最普通的自我合法化的一个理由；或者强调加害者一直是一个好人，只是讹了一位陌生人。这再次体现出陌生人跟自己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央电视台几年前曝光的食物胶事件也呈现相似逻辑。

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道德标准也同样在变化，昨天被认为不道德的，今天很可能就成为道德的。结果，就出现了道德判断标准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整个中国社会都在经历一次道德观念的大转型，作者把这个转型概括为从集体主义的以自我牺牲为中心标志的价值观向以个体主义、自我发展为主要标志的伦理价值观的转型。这个转型仍然在进行中，它一定要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好理解，这个大的社会背景即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经历的个体化转型。

如果认为失范社会是因为价值观错位造成的种种复杂现象，包括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在面对复杂现象，处在复杂漩涡中所产生的困惑、无力、无奈，以及急

于想挣扎、改变，或者有所行动，那么中国似乎已经进入失范社会。

（据阎云翔:《道德底线的突破及其伦理意涵》,《文汇报》, 2012 年 11 月 19 日）

■ 祝东力：“粗鄙化”现象分析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这个略带粗鄙的人物形象广受观众欢迎，实际上，这个李云龙并非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李云龙正是这个时代推出的一个形象代言。

鄙俗粗野的力量四处泛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也同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着内在联系。一个社会，在文与武、雅与俗、精与粗等等之间，应达到某种平衡，而不致畸轻畸重。但是，文武分途，文德与武德相互隔绝，恰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征。这种文武分途、各自片面发展的局面，曾经由于中国共产党而获根本改观。

80 年代，知识分子发起新启蒙运动，倡导个人自由、权利、尊严、唯美等人文主义价值，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文武分途、文武隔绝的局面开始恢复。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文革”后兴起的启蒙传统又相继受到国家、市场的打击和排斥，迅速边缘化。“十亿人民九亿商”，是 90 年代初的民谚。传统瓦解，价值真空，斯文扫地，于是“粗鄙”强悍登场。粗鄙，本质上就是失去文德制衡的、堕落的武德。在它面前，超越直接经验的知识、思考、公义等等都没有价值。再没有什么能够制约这种力量。这是传统衰微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大缺陷的表征。只不过，当今时代，传统中断，没有文德约束、丧失文德内涵的异化的武德表现为粗鄙——文学界的痞子小说、美术界的政治波普、乃至于影视界的李云龙，都是时代的产物。

但是，粗蛮横暴并不能保证挫败强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有文化的战略对手。片面的武德，粗鄙化的社会，由于排斥必要的知识、理论和思想体系，因此只能囿于狭隘的经验和视野，局限在十分有限的层次和水平。因此，需要文化升级，需要恢复文德与武德平衡发展的局面，需要有一种“道”，主义、宗旨、理想、灵魂、价值观贯穿、融会、统摄这二者。这对于信仰低迷的当今社会，注定是一

条曲折艰难的路。

（据祝东力：《“粗鄙化”现象分析》,《天涯》, 2012 年第 6 期）

■李之美：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介形态下的话语权格局。结合“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本文引出了新的一种研究视角——赋权视角。赋权常常与参与、权力、控制、自我实现和影响联系在一起。赋权与新媒体技术的嫁接，缘于赋权本身的赋予、提升弱势者权力与技能的主旨。媒介是一种推动的重要外力，其本身不能转移权力，而是人们通过和依靠新媒介技术这一平台，激发获取权力和维护权益的意识，同时将自身的潜能激发出来，来推动和促使权力的传递和转移。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社会力量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社会及普通民众都可以在他们的价值观基础上运用媒介技术。本文选择了三类新媒介形态的三个典型案例来分析研究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的改变。第一，“华南虎”案件折射网络论坛的力量；第二，博客时代的到来，能将克林顿拉下马；第三，“温州动车追尾”事件证明微博力量不“微薄”。新媒介技术是推动公众赋权的最重要的外力。新媒介互动、平等、去中心化等特征对于个人话语权的获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赋权过程中，个人的能动作用至关重要。同样的网络平台，同样的进入机会，因为个人能力、素养、习惯等的不同，将会导致个体间的极大差异。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涌现出网络社区中的“意见领袖”。

新媒介已经不简单是以往大多数研究中所认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或者中介，而是一种激发意识形态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一是对制度的冲击，二是权威系统和权威文化的破坏。在破坏原有传播体系和消解传统权威的基础上，公众利用新媒介实现了多种重建。一是话语主体的重建，构建了多元的、分散的主体。二是网络自组织的建构和发展，这类自组织的存在大大增强了集体话语权。三是公众参与新渠道的建构。新媒介赋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意义的局限性。第一，新媒介在打破传统权威，为公众平等赋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新的不平等。第二，新媒介环境下公众获取话语权可能导致另一个极端，即“网络暴民”的出现。因此，我们再强调公众

话语权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限权”。

（据李之美:《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浙江学刊》, 2012 年第 5 期）

■惠东坡：北京地区大众传媒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

所谓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际社会的民众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评价，是民众对他国的主观感知和总体印象。大众传媒是国家形象建构、传播、认知的最主要途径。京地区大众传媒庞大而系统，是中国传媒的旗帜，是构建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生力军。

北京大众传媒应秉承 “球土化” 的运作理念，一方面给公众提供全球共享的信息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优秀的京派文化传播，来满足当地的、本民族的或某一社会群体的需求。北京大众传媒必须处理好京派文化、民族文化、世界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应精选出京派文化中能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典型成分，使其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北京传媒在构建国家形象时，应该表现一个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只有这样，国外受众对中国的民族文化才会有一个较全面、系统的认知。我们对外传播构建国家形象应从世界文化的视角反思和观照自己，努力把包括京派文化在内的多元、丰富的民族文化介绍传播到世界文化大家庭之中。

目前，虽然北京地区的大众传媒都比较重视在传播中构建国家形象，但是对外传播的总体效率不高，效果不太明显，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的投入和实际产生的效果也不成比例。主要原因就是对外传播体系缺乏有效的整合，媒介资源的配置缺乏科学的优化。国家对于构建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体系缺乏统一完整的规划，处于不同传媒资源位上的大众传媒各行其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加之管理上缺乏科学性，使得各大传媒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此，我们必须研究不同传媒资源位的不同策略，推动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的结合，中央和地方的结合，系统内和系统外的结合，多种大众传媒的结合。这样，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传播和认知才能更加深入人心。

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必须加快北京地区新媒体建设和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进程，提高我国卫星电视、国际广播、通讯社、报纸等大众传媒的国际竞争力。在加快新媒体建设和传统媒体数字化改造的同时，积极推进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

资源整合，实现多种媒体的优势互补，已经成为我们营造系统、高效、立体的传播网络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惠东坡:《北京地区大众传媒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北京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5 期）

■孔建华：论首都文化——20 年来北京文化发展战略的构建与演进

首都文化，是一个多维度、多视角、复合式的概念。近 20 年来，对北京文化比较聚焦的研究有四次。第一次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将文化纳入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框架中，还没有独立出来、自成系统。第二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主要标志是市委市政府召开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随后发布《关于加快北京市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三次是在北京筹办奥运会期间，基于人文奥运、人文北京视角的系统研究。第四次是 2011 年，市委、市政府密集下基层调研文化，市委十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发挥文化中心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意见》（以下简称 2011 年《意见》）。

2011 年《意见》以示范性为本质属性，开启了首都文化的新时代。《意见》启用了文化经济概念，恪守先进文化使命，引领文化发展方向，增强文化创造能力，统筹区域文化建设，发挥激励引导作用，推行新型文化政策，亮出文化经济指标，培育文化消费环境。

从过去 20 年北京文化发展战略的构建与演进的轨迹看，以 2011 年《意见》为标志，北京以新的理念、新的举措、新的成果，初步回答了怎样建设首都文化的问题。即：首都文化建设要体现贯彻中央要求与反映北京实际的有机结合，要体现总结过去与把握当下的紧密结合，要体现大文化、大战略、大整合与新举措的有效配合。

（据孔建华:《论首都文化——20 年来北京文化发展战略的构建与演进》,《新视野》, 2012 年第 4 期）

■金元浦对话菲利普·多德：夜色朦胧中的美丽女人?——基于当下中国与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现状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先生和英国创意多德创意机构主席菲利普·多德先生从国家政策、产业历史、教育、人口等诸多方面就中国与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展开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对话，以下是对话的观点摘编：

英国一直以来将创意产业比作一个夜色朦胧下美丽的女人，大家都想娶她，而清晨醒来后突然发现她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丽，因此就将注意力转向生物科技，因为在这个领域更实际，它有确凿的数据。布莱尔认为创意产业这位新娘的确很美丽，而布朗认为生物科技更美丽。新政府想要回归金融服务业中。在英国，创意产业被当作是拯救国家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其实只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一小部分在全力推动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好比中国北京和上海与三线城市的区别，我们对它们的期望值太高了。伦敦确实发展得不错，但伦敦不是全英国。

在英国，除了伦敦和个别城市，英国创意产业一直都发展得不够好。应该说从一开始决策就没规划好。谢菲尔德是另一个问题的典型案例，那就是政府在这里对创意产业的发展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创意产业其实存在于其他所有产业的中间，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创意产业，金融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创意产业，这样思考就会好很多。现在是一个混合经济的时代，我们不能单靠创意产业，单靠金融产业，而是要相互依赖。我对中国在这一点上很担心，因为中国政府将创意产业视为救命稻草，其实各个地方的实际条件相差甚远。

中国的创意产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推动的，这和英国有相似之处。比如说，我们研究者提了很多年关于北京的创意产业发展问题，但最后还是要政府全面推动。在当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等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条件成熟是有困难的，因此我们也赞成政府做第一推动；但是在最初的大力推动后，政府应适时而退，使其回归市场调节环境中。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发展模式。我们有像北京这样的成功案例，但也有因为决策者的错误而导致不少城市发展困境的案例。

就中国目前的发展，政府做第一步的工作是正确的。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都是具备发展创意产业的城市，但其他城市就不得而知了。每一个政府应该考虑的是，是否每个城市都适合发展创意产业，谢菲尔德就不适合发展。政府对此应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智来判断这条路能否走通。当政府敲开了这扇门后，

就应该交给市场来运作了。那么市场需求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需求就没有长远的发展。

（金元浦、菲利普•多德:《夜色朦胧中的美丽女人?——基于当下中国与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现状的对话》,《中国文化研究》, 2012 年秋之卷）

5．机构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百余学者共聚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

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今日在京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为“汉学与当今世界”，共设有“‘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的走向”、“传统伦理与人类的未来”、“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对译及其差异”等 5 个议题，意在梳理传统汉学与当代研究的承续。

“世界汉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三届。前两届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9 年举行，旨在倡导中外学者跨越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族群身份的隔阂，由对话而增进理解，因理解而尊重差异。与会者认为，本届大会提出的“大汉学”与“新汉学”构想，将进一步推动世界汉学研究的发展。

（据中国新闻网摘编，2012 年 11 月 3 日，记者马海燕）

■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论坛隆重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晨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标志着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随后，成立伊始的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即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中国介入世界：未来十年的展望”学术论坛。

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是两校人文社会学科长期合作交流的阶段性成果，作为非实体研究机构挂靠于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据华东师范大学网站摘编，2012 年 11 月 12 日，记者于海兵）

■ 中央美术学院：主办“首届当代艺术与国家文化战略论坛”

11 月 24 日-25 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首届当代艺术与国家文化战略论坛”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举办。此次论坛是由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艺术实践与增强国家文化竞争力战略研究”课题组策划的首届学术论坛。此次论坛提交的学术论文，涉及美术史、美术理论、美学、当代艺术、政治哲学、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等不同学科和领域，是一次以问题为主导的综合性跨界的学术交流和研究活动。论坛共分为两大单元。第一单元，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与文化战略”。论坛的第二单元主题为“中国形象·当代艺术·文化权力”。

（据中央美术学院网站摘编，2012 年 11 月 28 日，作者宋曼青）

6.海外视野

■韩国：警惕“文化偏食症”

不久前，韩国影片《光海，成为王的男人》成为该国电影史上第 7 部观影人数超过 1000 万的本土电影。自 2004 年的《实尾岛》开始，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部观影人数突破 1000 万的热门电影。在韩国，作品销量达到 1000 万册的作家也不少。有韩国专家指出，这意味着韩国人文化生活的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只读销量第一的书籍，只看观影人数最高的电影。这样一来，畅销书籍的销量会更好，销量一般的书籍则越来越乏人问津。电影业也是如此。该专家认为，这种“文化偏食”的市场现象严重地破坏了文化生态系统，形成了两极分化，非常不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出版社将财力专注于投资畅销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长远看，不利于图书市场的良性循环和新人作家的发展。同样，观影人次超过 1000 万的大制作电影往往能引起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而很多不被关注的电影只有 1 万名观众，一些小成本电影甚至得不到上映机会。有学者指出，人们以为读到的书、选择的电影是自己想看的，其实只是被动接受了市场的强行营销。市场的良性循环应该是多品种、少量生产，而不是少品种、大量生产，韩国读者和观众已经染上了“文化

偏食症”。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2 年 11 月 07 日，记者禾泽）

■美国：两部税收法案促藏品流入博物馆

美国拥有博物馆逾 1.75 万家，博物馆内除了本土藏品，还拥有欧洲、埃及、中东地区、亚洲、拉美的许多精品，藏品的国际化水准很高。除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两部法案从制度层面促进了藏品的流入。

第一项法案涉及美国的关税。1909 年的《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规定进口 20 年以上的艺术品免税，1913 年又修改为对所有的艺术品实行进口免税。这项法案旨在鼓励美国收藏家购买国外的艺术品。同年，著名收藏家 J•P•摩根将其在英国伦敦继承的大量艺术品，花了一年的时间打包成 350 个箱子运送到美国。

第二项法案涉及美国的遗产税。如果说第一项涉及艺术品零关税的法案使全球的艺术品以低成本流向美国，此项遗产税的法案则起到激励收藏家死后将作品捐赠给博物馆的作用。1917 年，美国国会开始施行联邦税法，规定向非营利组织提供捐助的一律免除税费。在美国，继承超过 70 万美元的遗产要交 37％至 55％不等的遗产税，这使捐助艺术品给博物馆比将其传给子孙或交给拍卖行更有利可图。除此之外，美术馆常以重要捐赠者的姓名来命名展厅，或将对美术馆有重要贡献的人的名字刻在墙上，这起到了一种荣誉激励的作用。查阅近几年大都会美术馆年报可以看到，大都会每年接受的艺术品捐赠达千件，其中中国艺术品数十件，仅 2010 年一年，大都会美术馆就收藏了包括齐白石、于右任作品在内的 41 件中国艺术精品，其中大部分源自林语堂后代。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2 年 11 月 14 日，记者王聪丛）

7. 研究院之声

■ 蒋璐：以学术研究促进协商民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工作机制创新

2012 年 11 月 9 日，文化研究院与民进北京市委在京郊召开协同建设会，探讨如何进一步实现研究成果与参政议政的对接。在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文化研究院院长、民进北京市委主委刘新成介绍了文化研究院的总体情况。民进北京市副主委李焕喜和毛桂芬分别介绍了民进的基本工作情况，以及与文化研究院

的合作意向。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龚玉玺介绍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四个渠道——政协、直通车、提案和调研报告，从制度安排上看，这四个渠道在连接决策机构和民主党派方面是畅通的。其他与会民进领导在发言中反复强调，利用以上渠道参政议政的关键是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这一点应借助研究院的力量。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陶东风分别总结了一年来与民进北京市委合作的基本工作成绩，介绍了下一阶段合作的基本安排。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探索民主党派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协商合作机制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十八大报告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如何积极落实十八大对协商民主的制度要求，加强不同机构与团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是当前北京市文化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在实践中摸索出来一套“以学术研究促进协商民主”的工作机制。这套机制以学术研究为智力支持、以民主党派为沟通渠道、以政府决策机构为协商对象，在北京文化决策过程中实践民主协商，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2010 年，民进北京市委刘新成主委提出，北京市建设国家文化中心需要有具备长远发展眼光的“顶层设计”，应该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加强论证工作。民进北京市委的建议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于 2011 年 12 月批准成立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作为首都师范大学与民进北京市委共同建设的研究咨询平台，文化研究院在以下三个方面为首都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其一，从事基础研究，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院着眼于文化政策的长远目标和宏观设计，对北京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升决策的现实合理性，强化政策的社会效益。其二，整合社会资源，为决策广集民智、广纳群言。研究院每年向社会征集对文化决策有参考价值的课题，组织立项、公开招标并给予资助，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政策研究。其三，组织跨界交流，为决策拓宽视野。研究院的一项重要活动是组织主题论坛，邀请国内外学者、相关政府部门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共同就北京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促进不同观点交锋，激发政策创新。

研究院每月向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和相关政府部门报送两份刊物。其中,《北京文化通讯》定期整理汇编文化领域的重要信息。《文化决策参考》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进行理论讨论，提出决策建议。相关部门以领导批示的形式对研究院的政策建言给予反馈。从批示的内容来看，研究院的政策建言已经引起各级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认为“有信息、有内容、有参考”，要求“体现在政策文件中”。在此基础上，决策者还与研究院定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形成例会制度，对决策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此外，民进北京市委还与文化研究院展开联合调研活动，并及时汇总研究院的重要成果，形成更为明确的政策建议，进入决策程序，参与民主协商。

文化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创建了“以学术研究促进协商民主”的工作机制，为完善协商民主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协商内容上，这种机制立足于基础理论，着眼于科学决策，广泛汇聚社会力量，增强共识；在协商形式上，沟通了政府部门、民主党派与高校，利用多种渠道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形成了灵活多样协商民主模式。

（作者简介：蒋璐，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